

2014年2月7日,是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接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郭宝宏老师的电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毛老师,老万走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你……”

我瞬间愕然了……

一

我最初知道万启盈这个名字,还是在求学的时候。

我是在中国科学院读的硕士研究生,专业为科学技术史。恩师韩琦先生,是印刷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其舅父张秀民先生,更是治中国印刷史的大师,代表作《中国印刷史》是该领域迄今完备而系统的综合之作。一次韩师对我说:上海出版界有一位万启盈老先生,岁数很大了,但一直在做印刷史的研究,很不容易。由此在心底里埋下了能见到这位老先生的愿望。

2011年春夏间的一天,出版社领导偶然找到我,说有一部印刷史方面的书要出版,作者是一位老先生,社里想让我担任责任编辑。我接受了这一出版任务,并很快地联系上了作者及其助手郭宝宏老师。

我与郭宝宏老师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告诉我,万老是上海市出版局的老领导了,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33年转学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初级职业班和高级职业班,开始接触印刷技术和印刷理论,后来辗转到延安,被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的中央印刷厂做排字工;曾担任中央印刷厂部门主任、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等职,

差不多在距今三十年之前,我在上海新华书店从事图书宣传工作的时

候,为了印制书目、单页证订单乃至通讯录、年历、包书纸、“六一”课程表、书签、塑料袋等图书宣传品,曾经到过上海市印刷一厂、二厂、三厂、四厂、六厂、十二厂,群众印刷厂,中华印刷厂,新华印刷厂,美术印刷厂,青年报印刷厂,文汇报印刷厂,解放日报印刷厂,纺织局印刷厂以及扬中印刷厂等,我可能是新华书店员工中到过印刷厂数量最多的一个。因为留存着二本练习簿,记录着当年的宣传费开支,包括刊登广告、放映电影等,给我回想提供了支持。

二

现在年龄在50至80岁的读书人,大都知晓当年由上海新华书店编印的《每月新书》,它是一份像《新民晚报》整版大小(八开)双面印刷,提供当月由上海新华书店进货销售的文史、文学、文教等图书的目录,每期印刷1万份,通过分布全市的新华书店门市部供读者索取,也作为包书纸赠送读者。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传递资讯、图书供应渠道单一的年代,期盼、索取、阅读《每月新书》是很多读书人聊以备查或据此寻书的依据。《每月新书》是由前辈桑静老师开始主持编印,我是接班人。

当时,我的日常工作是拿着由旧年画纸裁剪的16开报告纸到市店供应科从社科、文艺、文教组业务人员的进货记录簿中抄写书目,发现重点书或可能有歧义的书还得根据“一书一卡”从进发卡片中粘贴着的“内容介绍”填写提要,这些卡片都放在双人办公桌边类似床头柜大小的抽屉里,我就坐在不知哪年就有

的小凳子上根据四角号码查找卡片撰写一句话书讯,内容提要,然后以出版社为序将书目剪贴编号,每期开设“书市徜徉”类目每期写上300字的短文,送印刷厂排印。可能“文革”时期出版的年画太多,“文革”结束后积压太多就被裁切使用

印刷史研究的“不老松”万启盈

◆ 毛志辉

【作者简介】

毛志辉 1980年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毕业,曾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现就职于交通银行总行企业文化部。曾在全国重要报刊发表论文和书评逾百篇,并被《新华文摘》及各大门户网站转载。

担任过绥德西北印刷厂厂长和中央印刷厂党总支委员;抗战胜利后,又接任中央印刷厂厂长,并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委员。他说,万老多年来都有一个心愿,就是编著一部系统的近代印刷工业史。

他也带来了万老的部分手写初稿。那工整而颤颤巍巍的字迹,仿佛让我看到了一个耄耋老人“爬格子”的情景。郭老师说,万老每天花费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在推进这部作品的编著工作,但毕竟年岁大了,进展速度并不是很理想,将来的编校工作可能会耗时耗力。另外,万老有几个特别的要求,比如,这部作品正式出版时,“國”、“產”、“華”、“東”、“製”、“餘”、“時”、“漢”、“葉”等九个字,要以繁体字形式出现;图书要做成串线装,书翻开后要能摊平;正文的字体要大,墨色要浓重,便于年纪大的人阅读;序言第一页要放一张彩色照片,其他都黑白即可……

当时,我就猜测,这位万老,应该是一位很认真、很顽固同时也很



▲万启盈先生正在编著《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郭宝宏 摄)

可爱的老人吧。

二

201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四楼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我和美编夏芳见到了这位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在进门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与印刷史相关的书籍与材料,论及印刷史学界的人与事,老人声如洪钟,思维清晰,谈起自己投身革命洪炉的激情岁月,更是神采飞扬、历历在目。

他先向我们介绍了他之所以写作《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的原因。他说,万老从事印刷工作整整八十

年了,他编写这部书,不为沽名钓誉,只求为后人的研究做一点积累的工作。他有时一天伏案七八个小时,近来听力减弱很多,助手郭宝宏只能通过在他纸上写字与他交流,不过他仍在坚持,自信能在三年内将续篇的30多万字也写出来……

我在纸上写下了“张秀民”、“韩琦”等名字,问他认不认识,并写了“韩琦是张秀民的外甥,我是韩琦的学生”。他看后,仰头哈哈大笑,说:“啊,看来找你来责编我这部书,是找对人了。我以前跟张秀民先生通过多次信,寄到嵯县去,向他请教印刷史的问题,北京的韩琦我也知道,但不熟悉。你看,《中国印刷史》是我经常要看的书,都被我翻得很旧了。”说着,他用手指指门口书桌上的那堆书,果然,有一本旧版的精装本《中国印刷史》在桌上放着,从外观上可以判断,显然已经被翻阅过无数次了。他又接着解释说:“我编写的这部书,跟《中国印刷史》还是不一样的。我做的只是资料整理的工作,很多资料还不是第一手的资料。”言语中带着诚恳和谦虚。

谈到书中的九个繁体字时,他非常郑重地解释,这九个字之所以一定要使用繁体字,一则希望以此促进海峡两岸的互相交流沟通,通过学术交流来增加相互的了解,争取早日和平统一;二则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和重视,汉字的简化给

行进在印刷厂的时光

◆ 汪耀华

【作者简介】

汪耀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外书摘》杂志主编,曾任上海新华书店图书宣传科科长、总经理助理,《上海新书报》总编辑,创办并主持“书香传媒”系列。编撰出版了《书道》《书街》《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上海书业名录(1906-2010)》等二十多种书。

(单面)了很多年。好像当时颁发的业务文件常用这种纸,那是为节约。

二

《每月新书》是在市印六厂印刷的,先是由桑老师带着去了几次,我一般会稍早吃过中饭就在江西路福州路市府医务室门口坐17路到顺昌路下,走几分钟即到这家坐落在弄堂里的厂家,把稿件交给生产科业务员即可回来。那时的业务员已经是宋师傅了,年纪比我稍大,常常笑嘻嘻的,态度也好。通常过两三天就会有电话来说排好了,我就去取校样。起初,原稿和校样是从生产科取的,熟悉后就直接到排字间拿了。

开始的五六年,这个排字间是我每月都去两三次的地方,房间显得很陈旧,因为只是排些零印表格、单据、文本,场地也不大。市印六厂曾经是上海合作社印刷厂,以胶印为主。在那里,我遇到了吕师傅,当时他负责排字间工作,是一位思路清晰、动作熟练、乐于助人的老人,只要由他亲自排版,我就会很轻松,因为他会直接排成版面由我校对,字盘上缺的字也会马上通知同事浇字,如此,文字或多或少在初校时就可以调整了。我校对后再到车间等着改好取回,再复核后送回付印。等到印好就由市店后勤组派车运回,派的车先是一辆三轮汽车(也称乌

龟壳),后来是丰田客货两用车,我随车运回市店后由秘书科大吴师傅按照分发单或交换或付部分发区县书店或单位个人。

吕师傅会有电话托我找一本书之类,我也会尽力。只是,当年忙于杂事,未曾很好地维护与吕师傅、宋师傅等的关系。因为我是桑老师的徒弟,新华书店的人,是可以不填会客单就进厂的,可以在食堂就餐,甚至在厂内随意穿梭的客户。在这里,我享受了四折优惠的《三希堂法帖》、《篆文大观》等书。当年,从出版社买书一般是七折,从厂里买的四折书归入“残次品”。不过,由厂里质检过的“残次品”在我等眼中实在是又便宜又好。

市印六厂顺昌路路口有一家泰康食品厂门市部,常常有碎“华夫”饼干当场称份量出售,可能是名牌,新鲜加上便宜,我曾多次受书店老同志委托代买,同事会很高兴付钱收货,而且,上班时是不便谈论这些事的,只能等工间操时悄悄地“交易”。

我那个练习簿上记着:1982年6月,《每月新书》印制10041张,排印代料共计224元。1985年1月,市店派不出车去运回《每月新书》,我就先坐公交车前往再叫出租,机动三轮车车费0.8元。1988年12月,在六厂印制《每月新书》8200份,工价574.00元。

三

在编《每月新书》的同时,受到各方面的鼓励就开始编印专题书目,譬如与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合编《管理书目》、与上海音乐书店合编《音乐书目》、与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学术书苑合编《文史哲学学术书目》、与艺术书店合编《艺术书目》、与上海市版书店合编《省版书目》、与教

育书店合编《教育书目》、与上海工具书店合编《工具书目》等等,当时,上海的专业书店是全国同行的榜样,这些书目更是各地读者按图索骥的信息源。编印这些书目,从抄书目、写简介到排印、交货都得到了这些书店的鼓励。

控江路上的市印三厂,现在已是一片废墟正在平整土地,可能是被置换了。那时,与六厂相比三厂那就很气魄了,生产科贾科长和承接零件业务的小李都很随意。因为是大厂,书目的排字只要稍为安排一下挤挤就可以了,安排印刷就有点麻烦,但好像也没有耽误过。三厂是我们发行二科陈丽贞老师介绍的,是印《省版书目》。1983年3月(第二期)印了15000张(小五号横二面),总价317.13元。市印三厂是铅、胶印全能厂,也是国内重点书刊印刷厂,当时是《辞海》缩印本的指定印刷厂,我“开后门”从厂里买了多本四折《辞海》。这是大书,如果是单本小册子,我提出要,贾科长都会免费送我。生产科在午休时间的陆战棋四国大战是很有看点的,人多嘴杂,下棋的人会不由自主,我难得上场,既是陌生而且站在旁边指点江山更有趣,其实,我下棋功夫是从小在弄堂的路灯下练成的。

记忆之中,我最早参观的印刷厂是中华印刷厂。但是,与其发生业务却是2004年7月为一本《书展》的印制,承潘厂长的全力支持。当然,潘厂长是看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领导顾行伟的“面子”。中华厂当初在澳门路时有个中华书局陈列室。

为了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征订书目等,我去过群众印刷厂、广播事业局印刷所、上海工人报印刷厂等。我去总工会地下室的上海工人报印刷厂排印书目,是承该报总编闵孝思

我们带来的未必都是好处。他还说,他非常希望能看到海峡两岸能各自挑选出几个字来改变,大陆使用繁体字,港澳台使用简体字,以此达到一种“书同文”的文化默契。

谈完了书稿后,他意兴很浓,又向我们谈起了他的工作经历。在延安清凉山脚的万佛洞,他排过字,拼过版,管过工务、当过厂长,甚至还跨过枪、当过连长、打过游击。

1954年,他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主管印刷、科研、教育、物资等领域。当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任命状,他一直珍藏着任命状,由此激励着他不虚度每一天……

三

毫不夸张地说,万老是为印刷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的。

解放初期,他主持了对上海二千余家印刷企业的管理、改造工作。他作为创始人之一,为1953年上海印刷学校的创办竭尽所能。1958年6月,他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79年3月,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1986年1月离休。2009年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他在离休前后致力于中国印刷工业史的编纂工作,倡论“书同文”。他参与了《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词典》《印刷科技实用手册》《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等书的编纂工作,尤其是在编著《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时真可谓呕心沥血。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堪称是关于近代印刷工业发展的史料大全。

的关照。后来,闵总负责上海政协报时,还吸纳我做了通讯员。

我到过威海路的照相制版厂很多次,先是为书目的一些小图案做锌版,后来是照相排字。1983年到厂里做“庆祝六一”塑料袋锌版2块,396平方厘米(单价0.04元),合计17.84元,隔天取货。威海路路口有个街心花园,曾经是路人聚集议政的地方,偶尔,我会停步聆听一会儿。因为从市店到那里,49路公交车没几站,基本不误事。

我去扬中印刷厂是1984年为上海新华书店建店三十五周年、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成立三十周年而赶印一本纪念册。之前,不知道扬中和扬中印刷厂,等到跋涉到达后,看见是一家破旧的印刷厂,无奈之情一直留到了现在。在那里住了一天,厂长客气,派了两人陪我一起吃晚饭,主菜是大闸蟹,是用洗脸盆装的……

1999年之后,我去过昆山亭林印刷厂多次,这是“书香系列”策划出版图书时的定点印刷厂。当时选厂时我要求印制工价要比上海同行下浮百分之十,最后通过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科推荐而选定这家厂。我是这家厂的阶段性主顾,有几年,我们年销售一千万的图书都是委托这家厂印刷的。这个时候,排字、排版与印刷已经分离了,排字也告别铅字过渡到电脑入录了。如今,我虽然在出版社工作,但几乎已无需直接与印刷厂联系,因出版社已有专职联络人。

印刷业,曾经是上海轻工业的骄傲,经过多年的撤并重组,我曾经涉足的在市区的印刷厂,几乎都从原址消失了。

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工人师傅,因为,我们彼此都努力过。



双周刊 第397期